

◆ 简平专栏·简言之

笔筒

简平

我们最早的笔筒是什么样儿的，我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那个玻璃瓶笔筒。其实，那个玻璃瓶笔筒原本是一只花瓶。说起来，这只花瓶还是我父母结婚那会亲戚送的，不是一只，而是一对。这对玻璃花瓶非常普通，是稍稍深一些的茶色，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没有精致的花纹，只有两根扭斜的粗线条，但很挺拔。虽说玻璃并不薄，可其中的一只还是不知何时给摔碎了。后来，我父亲开始习学国画，而我也开始练写毛笔字，于是，就把剩下的一只花瓶当作了笔筒，毛笔放进去还能高出一截，家里人都说很合适。

这个合适的笔筒用了很长的时间。那时，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桌，父亲画画和我练字都是在吃饭用的四方桌上，所以，笔筒是放在五斗树上的，要用的时候拿下来，不用就放回原处。五斗树上有面大镜子，笔筒就搁在镜子的一边，这样，镜子里就又有了一只笔筒，不过只是露出半个身影，可斜伸出去的毛笔倒是常常紧贴着镜子的，因而有时看上去真有如椽大笔的感觉。总是以为这笔筒会就这么一直用下去的，可是随着父亲的去世，随着我不再练字，这个笔筒便被逐渐地冷落和遗忘了，及至后来数次搬迁，都回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时候没有了它的身影和踪迹。到了这时才感到有点惋惜，毕竟它是刻录了往昔生活岁月的许多痕迹的，结果我们那么轻易地就将之遗忘或丢弃了。

我现在用的笔筒是陶瓷做的，因为无需再插毛笔，低矮了许多，也不像原先的那个玻璃瓶笔筒细细的身材，是圆鼓鼓的了。同样很普通，只是喜欢它的颜色，底色是浅浅的淡淡的蓝，笔筒口则是一圈湛蓝；只是喜欢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心静”，还有几行草书“宁静致远，淡泊以清心”。而今我有了书桌了，它便放在了书桌上，这与书房的氛围以及我的心境都是般配的。这个笔筒还配有一个托盘，一样是浅蓝的底色和湛蓝的边框，一样有“心静”两个字，我把一枚印章、一块橡皮放在这个托盘上。有一阵，我还在



简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影视、新闻作品获有多种国内外奖项。“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

◆ 人间小景

露天电影

迂夫子

“来电影啦，来电影啦！”孩子们一看见放映员的马车进村，就跟炸了庙似的满院子乱窜，呼哧带喘地跑去向爹娘邻里报信儿。

天还没黑，娘就比往常更早地喂饱了鸡猪，喂饱了人，然后端出半簸箕瓜子在大锅里翻炒。小时候每回看电影，我都要带点零嘴儿，瓜子是必不可缺的，有时还会带上几颗西红柿或者一个大大的香瓜，所以现在每次进电影院，就觉得只有可乐和爆米花，实在太单调。

娘在灶上炒瓜子，我在灶下烧火。灶上，娘握着铲子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地翻炒瓜子；灶下，我心里急得跟锅里的瓜子似的直蹦，一直惦记着看电影的好位置被狗蛋儿和二憨们给占去了，还怕电影提前放映，错过了开头。侧耳倾听，远方隐隐约约似乎有乐声传来，更是心焦，越发盼着瓜子快点炒好。

娘终于停了铲子，瓜子被收到簸箕里。娘一声“好了”，话音还未落，我的小手就伸向簸箕里还滚烫的瓜子。一转眼，褂子兜、裤子兜里装得满满的。出了门扛着板凳就撒丫子跑起来，身后颠落了一溜儿瓜子，隐约传来娘的骂声。

西边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大队部的院子里两根木杆上绑上了雪白的银幕，被风吹得像张开的帆。白帆红霞，像极了个美妙的童话。银幕下最好的位置上早已摆满了凳子、椅子、小马扎。我们一帮小孩子就围着绑电影屏幕的杆子追逐，一不小心就会一脚踏到牛粪上，那杆子平时是用来拴牛的。

男女老幼，陆续坐满了大队部的院子，有时候连墙上、树上都蹲着人。大家叽叽喳喳地吵吵闹闹，震得房檐下的麻雀“嗡”一声飞走了。夕阳一点都不识相，露着红彤彤半张脸，迟迟不肯下山，等着孩子们心焦。

放映员慢条斯理地安放电影片子，大家都讨好似的恭维着放映员，问是什么片子，几卷片子，然后就算得看到几点钟。1980年代村子里，放映是一份很牛活儿，虽然只是个兼职，农忙时一样得下地干活。

放电影的程序是先加加映片，往往是纪录片，因为不是故事片，所以不招我们小孩子喜欢。场子里仍然人声鼎沸，呼儿唤女声，喊爹叫娘声，此起彼伏。我就掏出瓜子“卡味、卡味”小耗子一样地磕，一会儿地下就嗑出一堆瓜子皮。

终于熬到换正片了。换片时，屏幕一片雪花白，会看到四脚朝上的椅子被人扛着走，偶或有大大的人头影子突然出现。有人就开始搞怪了，用两手绞在一起演皮影戏：一个小兔子，一跳一跳的，两只耳朵直甩扇。惹得银幕下的人哈哈

大笑。电影突然播放了，小兔子还在屏幕上跑，放映员就在大喇叭里喊“挡光的闪一闪，挡光的闪一闪”。有人笑骂：“准家的鬼崽子……”引得大家又一阵哄笑。

那时候，翻来覆去播放的就几部电影。我能叫得出名且印象最深的是几部战争片，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等，再就是一些样板戏了。

最喜欢战争片，很多片子看了好多遍，百看不厌。比如《地道战》，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故事情节贼熟，熟到很多台词都能背下来。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电影的剧情，然后就模仿着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也不知道是谁和谁争论起来，争论的话题是：高传宝一枪打倒了鬼子山田，到底打到了左屁股还是右屁股？

有的说是打在左屁股上，有的说打在右屁股上，“左右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打赌，看电影来验证。当电影演到高传宝把枪伸出去要扣扳机的时候，却直接跳到了山田躺在地下的镜头，山田捂屁股的镜头竟然没了！

这是不可能的啊，山田应该是捂着屁股倒地的，至于捂得是哪一半，正是打赌的关键所在。竟然没有了！后来想大概是影片播放的次数太多了，这一段“烧”了，被放映员剪掉了。放映员不知道这一剪刀对于他来说很轻松，却在我们小伙伴中投下了一颗炸弹，打赌的双方争论不休，甚至差点动了铅笔刀。

露天电影院里，夏天，蚊虫叮咬，鸡猪牛粪熏烘，汗臭和着狐臭各种怪味混杂在一起，但是我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冬天，裹在狗皮帽子棉大衣里的我们瑟瑟发抖，棉靴鞋里的干草虽然在火炕上烤过，仍然挡不住北风吹。

冬天的露天电影场的声音才可笑呢。一阵阵沙沙沙的声音，那是观众在嗑瓜子，仿佛蝗灾之年飞进苞米地的蝗虫啃咬苞米叶子。还有此起彼伏“蓬蓬”撞击声，那是冻得挺不住的人在跺脚。那时候的乡下，没有羽绒服、没有大军靴，我们虽然全副武装披上了羊皮袄，戴上了羊剪绒的棉帽，还是挡不住西北风贼一样地钻进来偷走热量。多想屋子里看电影啊，可是只有城里才有电影院，乡下只能看露天电影。

我对小时候冬天看露天电影最深的记忆莫过于电影散场后躲在墙角里撒尿。手脚冻得麻木了，哆哆嗦嗦半天才解开腰带，“哗哗哗”放出水来，细水流地似乎忘了时间的存在。跟着一股暖流从脚底上升腾起来，人就仿佛暖和了许多。然后跑回家，“嗖”一下子跳上火炕钻进被窝，躺在滚烫的炕上瑟瑟发抖。整晚都在做梦，梦里都是才看过的电影。

◆ 史海泛舟

莫友芝的安庆缘

胡启涌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偃，号邵亭，晚号眵眵。贵州省遵义沙滩人（祖籍贵州独山），家学渊厚，著述颇丰，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

咸丰十年（1860）三月，已近50岁的莫友芝再度落榜后，心绝仕途，在京师陶然亭作别翁同龢、张之洞等名流后，携次子莫绳孙离京南下入皖。他在给家中长子莫彝孙的信中说，自己决定去安徽投奔曾国藩：“我四月尾五月初必出京，由湖北走安徽访曾翁翁（曾国藩）与尔九叔（莫祥芝），作数月聚首，更图出路也。”莫与曾相识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当时莫友芝在京候榜期间，去琉璃厂寻书而偶遇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相谈汉学之余，曾为莫氏之学惊叹：“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从此订交终身，相交笃厚。

莫氏父子自1860年三月出京后，取道湖北去安庆投奔曾公，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七月在保定拜见黄彭年。九月在武昌会见乡友黎兆勋。十月在怀宁县与九弟莫祥芝相聚。十二月底入皖后，在望江县令周景兼处度过除夕，并致函曾国藩：“本概及是月内驰谒，缘东流道小不靖，遂迟渡江。”

次年（1861），莫氏父子受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折回到武昌为其校订《读史兵略》，直至六月初才校毕呈交。七月三日，莫氏父子再度入院，于八月八日在东流行营会见了分别十四年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故交见面，格外亲热，曾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午刻清理文件，莫子偃来，久谈二时许，即在此便饭……”莫友芝当日也有记：“食后，谒两江总督钦差曾国藩于城中行营。”之后，曾将莫友芝留在幕中，委以“卢阳书院”山长一职，每月俸薪照领，兼为曾府校勘诗文古籍。同时，曾氏还为莫绳孙“揽”了一份刊刻关防印的差事，这样一来，莫氏父子同事曾氏帐下，过上了平稳的日子。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五日，被围一年多的安庆终于被湘军攻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驰往安庆，指挥各军继续追剿太平军。莫友芝随后即迁安庆。期间，莫氏虽然身在皖地，却心系黔地家小，当时贵州又值号军作乱，民不聊生，家中妻小，安危堪忧，这令莫友芝寝食不安，愁苦终日。曾国藩知情后，应允莫氏将贵州家小接来安庆居住，以避战乱。莫友芝感慨不已，立即去书家中长子莫彝孙，嘱他速带家人前来安庆。得讯后，莫彝孙即与母亲、八娘、弟弟、妹妹数人一起，带上父亲留在家中的藏书若

◆ 小说世情

干，于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二日从遵义出发到黔江，再至重庆后乘船，九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一家老小乘船至东湖红石子河段时，突发事故，乘船被撞成两截，所幸全家老幼有惊无险，只是衣物损失大半，所携藏书多数沉没江中。十月六日，莫友芝接到彝孙“途中遇险”“即可到达”的来信后，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一家人离开五年后，终于重聚安庆。忧的是全家在一起后，开销倍增，负担堪重。莫友芝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数月以来欲谋归料理，恐道路阻滞，甚切焦忧，既来亦暂慰耳。室屋之费，朝夕之资，又增愁累。”

同治元年（1862）十月十八日，在莫友芝父子的焦急期盼中，历86天舟车之旅的家人终于到达安庆，船刚靠岸，长子彝孙便带上弟弟妹妹上岸拜见父亲。次子绳孙则登船礼见母亲和八娘，然后与弟妹共话别后之情。莫友芝在当天晚上的一盏灯火下欣然记下：“五年阻绝，历百险来，无恙，喜可知也。”莫友芝一家相聚安庆后，暂时居住在三步两桥的德发店。

这时战争仍急，就连近在祁门的九弟莫祥芝因军务在身，也不得到安庆来看望从老家同来的女儿惠。可是命运弄人，莫祥芝没有等到与爱女见面的一天到来，女儿惠因突发天花病，死于德发店寓所里。十一月初三日，痛失侄女的莫友芝伤心记下：“午后侄女惠以痘殇于旅店，惠失母者七年，所今随其继母来，历重峡舟环不死，而死于此，尚不得见其父一面，伤哉。”满纸清然，让人读之沾襟。第二天，家人忍痛将惠埋葬于安



远方 许萍 摄

呼日格窃贼

张港

盖严实车子。再看看，四方无人。一竿往河边去了。

走走走，找到了甩竿的好“窝子”，这儿，必有大鱼，怎么看都有大鱼。

怪了耶！换了面食，换了蚯蚓，鱼脊在水面翻花，却不咬钩。刘一竿累得没了筋骨，急得毒火攻心，就是不咬。

看看太阳，一竿对自己说：我刘一竿今儿要跌大跟头，要把脸丢这儿。一看表，得回程了。心沉沉，嘴苦苦。

走走走，一竿嗅到鲜鱼的腥味。寻味而去，看见一个临时存鱼的苇席鱼囤。

鱼囤中，全是奇鱼全是大鱼，鲜活者。一竿这种人，见这场景，惊讶得不行。

四围无人，再看也是无人。一竿想起关于钓鱼的相声，他脚一蹶，“丢了脸，回来了！”就拣着挑着往网兜里装。

得鱼忘筌，一竿看不到那藏车的小桥了。青苇茫茫，西西南北，全一个样。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看到害怕时，一竿舍下脸，喊起来：“有人吗——有人吗——”最后喊出“救命”。

一只小船一条汉子，摇晃来了。一竿说自己迷路了，找不到小桥了。汉子不答，舍船上岸，示意一竿跟着走。

桥到了，车尚在。刘一竿得胜回城。钓界人人称赞，人人知道刘一竿钓得大鱼，钓得奇鱼。

儿子写作业，孩子拿张白纸，上面一个大大的“窃”。

“爸爸，这个字，下边是七还是提土？”儿子问。

一竿感觉，孩子的眼睛怪怪的，像是嘲笑，又似有恨恨地暗骂。

庆北门外二里处。随后，莫友芝含泪写信，将此事告诉身在祁门的九弟莫祥芝：“惠渐长，婉婉可人。历险能生，当能长寿，乃月之三日，竟以痘殇，尚不能见其父一面，伤何可言，尔我稍存达观，一痛可了。唯令绳及阿嫂常慰弟妇耳。”今日捧读此信，遥想当年，祁门前线的莫祥芝得知爱女逝去时，定是泪湿战袍，其情何堪。

莫友芝一家在安庆德发店的住所，院小室窄，出入逼仄。十二月二十四日，莫友芝托好友姚慕庭寻租别处。好友当日就在李八街寻得一处，稍信给莫友芝说，新租的房子虽然外面窄，但是里面宽敞，又通风。得讯后，莫友芝携两个儿子同去察看，并满意定下。两天后的中午，全家搬出只住了66天的德发店，移至李八街居住。当日莫友芝有记：“大雨，家人乘午雨少止，移寓李八街。”

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克金陵（今南京），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率部入驻金陵后，立即施行“养活细民”政策，重建战后金陵。莫友芝亦随之迁入，并在曾国藩的资助下，在金陵南门大街租得一住处，于十二月二十日，全家离开安庆李八街移往金陵居住。莫友芝一家于同治元年（1862）十月十八日相聚安庆后，先后住在三步两道的德发店和李八街两处，共住两年零62天。全家移居金陵后，莫友芝受曾公之托，悉心《唐写本说文木部》的考订和编校，撰写《影山草堂本末》等著，还将已藏之书，在金陵三山街建起了“影山草堂”藏书楼。



远方 许萍 摄

窃贼！”

上班开会，刘一竿忽然心里一乱，感觉背后全是手指在指指点点。时时有个声音：刘一竿是个小偷，偷鱼的窃贼。

懊悔，恐惧，刘一竿再也不能承受了，他决定到那个小村，向人家说明，赔礼道歉，给人家鱼钱。

刘一竿费了很大劲得知这个小村庄的名：呼日格。知道与呼日格的人语言不通，一竿特意请了翻译。

到得呼日格，刘一竿见人一个大鞠躬，村人围上来指指点点，像看大熊猫。一老人上前，与翻译对话。

翻译说了几句，手脚齐上，比画起来了，左拧右晃搔脑袋。刘一竿急了：“翻呀！怎么卡壳灭火了？”

翻译憋得脸通红，还是左拧右晃搔脑袋。

刘一竿说：“你不是老翻译么？你是怎么了？”

翻译一跺脚，说：“他们说的是方言。”“方言怎么的？”

“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偷这个词。”翻译说。

